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崛起与北伐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崛起与北伐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崛起与北伐 / 杨天石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9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ISBN 978-7-5177-0306-8

I. ①崛…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595 号

书 名: 崛起与北伐

著作责任者: 杨天石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306-8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0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88919581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370118561@qq.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新 序

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所作《念奴娇》词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之间，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全长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6000 米，宽 130~200 公里，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它被称为“万山之祖”，又被视为中华“龙祖之脉”。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功罪”，慨叹于“谁人曾与评说”。

昆仑山可以“评说”，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评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知美丑的镜子，是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的教科书，因此，它应该被人“评说”，任人“评说”，特别是自由“评说”。

首先是“说”。历史已逝，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历史学家“说”，用嘴、用文字或用图像，它才能广为人知，传之久远。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精细考辨，力争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能“胡说”。“胡说”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贻误读者。其次是

“评”。“评”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议论和价值判断。在“说”与“评”之间，“说”最重要。“说”是基础，只要“说”得真实、准确，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说”的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一方面，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多年来，我是主张先“说”后“评”、多“说”少“评”，甚至可以只“说”不“评”的。最不应该的是，不把史实说清楚、道明白，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有意掩盖、“虚无”、扭曲、夸大部分史实，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史实”，那就更等而下之，应该坚决反对了。

世无超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同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所“说”、所“评”，都可能不当、不妥、不全，甚至大谬不然。怎么办？百家争鸣呗！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是清除谬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一花、一派、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如果从1958年选注《近代诗选》开始计算，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如果从弃文从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也已经37年。笔者所写论文、札记曾选编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出版。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甚至被盗版。由于这套书部头大，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颇多不便，因此，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揭开民国史真相”为总题，改出七卷本。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风云版”所分为据，稍作调整，仍为七卷。应该说明的是，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因另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第三辑等专书，本套书暂未收入。

书中“评说”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杨天石

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原 序

人们生活在今天，规划并创造明天，自然希望了解昨天。昨天就是历史，一切过去了的都是历史。

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阅读历史著作。自然，这样的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假的或掺了假的历史著作，人们不会愿意看；讳饰或有所讳饰的历史著作，人们也不会乐意看。但是，历史著作要达到真实、客观、公正，并不容易。这是由于：其一，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许多事件，策划于密室，进行于幕后，公开者、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半真半假，甚至全假。其二，历史本质的显露需要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尚未终结之前，人们一时还难以全面认识其本质。其三，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即使对同一事件，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其四，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爱憎，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有某种偏见、局限、谬误、片面性在所难免。其五，许多事件没有记载，或挂一漏万，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研究历史难，写出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历史更难。历史学家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再现、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达到了这一境界，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并不将历史学看作科学，而是将之视为工具——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宣传工具。例如政治家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利用历史来宣扬本派主张的正确，批评对立派别的谬误，或者

用来宣扬某种于己有利的观点，以期影响社会，塑造舆情，争取群众，为己服务。权力机构会为史家规定这样、那样的禁律：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写；必须如何写，不能如何写之类。其结果是：有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张扬之，放大之，变造之，奖掖之；不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隐匿之，缩小之，扭曲之，禁绝之。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往往妍媸随意，美丑随时，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哪里有真实可言，哪里有科学可言！

当然，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中国古代讲究经世致用，于史学，则特别强调其“资治”功能，这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如果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要它何用！因此，本书著者赞成史家关注现实，“经世”“资治”，从这个意义上，著者肯定“工具”说的合理内涵，但是千万要注意，史学的这种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不能故意扭曲、剪裁历史以为己用。有些人常常不懂得，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扭曲者有时会取得某种效果，但有时则反，其效果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林则徐有诗云：“青史凭谁定是非？”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历史的真相会大白，是非也会有公论。

本书著者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当然，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著者

2009年8月3日于北京九华山庄

目 录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1

陶成章是光复会领袖，和孙中山、陈其美有歧见，蒋介石将其暗杀自然绝对错误，然而，在蒋本人看来，却是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大义”之举，为何？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10

早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有一定思想基础。他曾饶有兴趣地研读马克思著作，但是，印度泰戈尔的学说却使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天理”与“人欲”之间的交战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 30

蒋介石早年既是革命志士，又是浪荡子弟。他曾用宋明理学的修身之道和自己的劣根性进行斗争。

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48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孙中山倡办，许多国民党人参加。在交易所中，蒋介石受到大商人的排挤，使他萌生对资产阶级不满，立志改造中国社会。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 73

蒋介石访苏，目的是争取苏共同意，以蒙古的库伦作为军事基地，进攻北洋政府，未能如愿。当时，蒋介石接受中共“二大”观点，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共产国际则要求中国立即实行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措施，并且要求蒋介石参加中共，为蒋介石婉拒。

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四项提案 112

国共合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殚精竭虑，希图加强国民党的战斗力量。

国民党档案中的毛泽东手迹

——读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115

国民党档案中保存的毛泽东信函手迹，反映出毛泽东当年的工作强度、效率与成绩。

国民党中央致毛泽东函存稿

——读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118

国民党中央致毛泽东的信函，反映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也反映当时的革命形势。

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125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除办理党员登记外，还包括建立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等方面。初期工作有成绩，不久即因“容共”问题发生左右分歧。

瞿秋白的《声明》与国共两党的“分家”风波

——读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132

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合作；合作后，一部分人继续要求两党“分家”。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瞿秋白发表声明，维护国共合作。孙中山则激动地表示：“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142

联俄、联共（容共）、扶助农工，通称“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

中山舰事件之谜 159

国民党右派为了拆散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利用形势和蒋介石的多疑心理，制造谣言，使蒋介石误信，汪精卫和苏联军事顾问勾结，将军舰开到黄埔，是为了绑架蒋介石，将他送往海参崴，使他离开中国革命的中心。蒋介石于是调动兵力，逮捕前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

中山舰事件之后 180

汪精卫等计划反击蒋介石，苏联顾问不支持，汪负气出走。苏联企图“利用”蒋介石，协助他取得最高权力。蒋提出“整理党务案”，企图限制共产党。

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始末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199

发展冯玉祥加入国民党，肇端于廖仲恺的建议。他将此一任务交给徐谦，徐谦一直为此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 203

北伐战争的胜利既和战争的性质、人心向背、国共合作及国际国内环境有关，也和战略、策略的运用得当有关，其内容就是“各个击破，远交近攻”。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223

国共合作中，发生领导权之争，蒋介石派邵力子去苏联，目的是要求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 244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为了夺取革命领导权，曾和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合作，夺回了部分党权和政权，但很快，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四一二”政变。

陈独秀建议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269

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即，陈独秀却主张大量发展国民党员，扩大左派力量，“拉住小资产阶级”，“限制将来军事力量之右倾”，以便和国民党右派斗争。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274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陈独秀是中共领袖，二人一度关系密切，但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吴稚晖却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检举”陈独秀和中共，成为蒋介石“清党”的舆论制造者。

“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 289

蒋介石在政上海发动政变，武汉政府处境困难，政治谴责取高调，而军事上则回避和蒋介石决战，对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又判断失误，终于未能挽回颓势。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305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共之争有原有因，有是有非。1927年的“清党”“分共”使两个曾经并肩战斗的党成了刀兵相见、不能共存的仇敌，但是，从大的长远的宏观历史观察，仍属“兄弟”之争，是应该可以泯去“恩仇”而“相逢一笑”的。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近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入，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

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入，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

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①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

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十二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① 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刘霖生问光复会及焕卿事书”，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事略》还说：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鸣）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陶有可责之过，并无可杀之理。在蒋所述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

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沈缙云家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①。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②。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盟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③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嗾

^①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②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载于《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③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4页。

动军队”有关。^①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官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②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煽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这就意味着，要将孙再次放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孙中山因此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③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革命队伍有再次争吵、分裂的危险。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 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

^① 太炎口授，寂照笔录：“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载于《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页。

^② 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载于《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③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附录，《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参见前引太炎口述，寂照笔录：“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

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①。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②

(2) 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③。

(3) 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④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⑤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⑥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⑦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⑧。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

① “回忆辛亥”，载于《辛亥革命史丛刊》（二），第163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③ 《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④ “光复义勇军纪闻”，载于《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参阅许仲和“章炳麟撰龚未生传略注”，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⑤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2年。

⑥ “杭州电报”，载于《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⑦ “杭州电报”，载于《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

⑧ 《越铎日报》，1912年1月12日。